

△志：文藝雜誌的 力量——《中國學 生周報》

「羅卡：我估計整個文藝風氣，由六十年代、嬰兒潮那一代，他們喜歡現代化、現代主義的東西，所以帶來了很多新力量、新念頭，年輕人有一顆跳躍的心，《周報》介紹的新事物能刺激到他們，看完以後可以買書看，和老師談論，《周報》確實成了這樣的橋樑。也不是灌輸，只是起了刺激或啟發作用，最大的作為是帶讀者們走上現代的道路。」



我們對《中國學生周報》(以下簡稱《周報》)的好奇，源於每當訪問一些資深本地藝術家、創作人，談他們對文藝的啟蒙，他們就會不經意提到《周報》。生於52年的它究竟有何魅力?為何上一輩文藝青年都是它的粉絲?翻閱有關資料，始發現《周報》真是文藝雜誌一個傳奇——出版了22年，至1974年停刊，對比現今許多文藝雜誌難以長久經營，它，是一個奇蹟。據說《周報》當年最高峰、每周銷量多達兩萬份，每逢周四就有很多讀者到報攤詢問「《周報》出左未」?

是《周報》囊括了太多文壇裡閃閃發亮的名字?當中有太多膾炙人口的版面?還是它的新思維，引進很多新事物?抑或，它已成了一個培育藝術家、作家的搖籃?

雖然不是生於那個年代，本刊卻有幸邀得羅卡和陸離，分享在《周報》工作的點滴，從而了解文藝雜誌，其實可以併發怎樣的力量。



* 61年後，曾任社長 - 胡菊人、陳特、林悅恆等;曾任總編輯 - 黃韻傑、姚拓、羅卡等;編輯 - 陸離、張凌華、吳平、何法端、蔡廣等;寫作者 - 唐君毅、崑南、余光中、柏楊、朱西甯、戴天、金炳興、小思、西西、石琪、譚家明、許鞍華、亦舒、李國威、杜社、綠騎士、劉天賜等。
■ 文:《△志》編輯部
■ 圖片提供:羅卡
■ 鳴謝:羅卡、陸離、香港電影評論學會



上面 - 陸離、西西、陳任、舒明攝於 1960 年代中。



右圖 - 當年社長林悅恆、石琪、由美回港的吳宇森、陸離合攝於約 2003 年。

《周報》的文藝版也很有影響力，當中的詩、散文、小說，還有全版登的短篇小說，是由名家帶領去寫。名字是星光燦爛的，有司馬中原、余光中、柏楊、朱西寧... <詩之頁> 有不少當年的詩壇名家投稿，也斯、蔡炎培、西西也有編過。當你閱讀當中的詩，你會發現有很多好詩，包括有戴天、鹿南、金炳興、台灣周夢蝶等的詩作。

我估計整個文藝風氣，由六十年代、嬰兒潮那一代，他們喜歡現代化、現代主義的東西，所以帶來了很多新力量、新念頭，年輕人有一顆跳躍的心，《周報》介紹的新事物能刺激到他們，看完以後可以買書看，和老師談論，《周報》確實成了這樣的橋樑。也不是灌輸，只是起了刺激或啟發作用，最大的作為是帶讀者們走上現代的道路。

以往都有前人將中國文化現代化，藉科學、民主，和參考西方的東西，嘗試將中國豐富的文化現代化，注入新的活力，其實五四已開始這樣做。也有很多人努力在海外建立所謂海外中華，這當然是最高的理想，《周報》未去到這種高度，但希望做到基礎的工作。

我也是加入《周報》才真正認識多點中國文化，被他們感染。因為我本來喜愛西方事物，不喜舊文化。我在大學唸陰險海光、羅素的哲學，本來對中國的文化了解很少，自從入友聯後慢慢被感染。

具體一點，我做得很开心啦，做得不錯啦，坦白說做過不同工作，還是第一份工作最有滿足感，最具啟發性，甚至比在無線電視台受更多啟發。我覺得在《周報》工作，能幫我根本基泰穩，在《周報》認識了中國的傳統，同時也認識宏觀的事物。跟一班

朋友看電影，看有關文化的書和雜誌，總是很興奮，看完後又可以一起談一起編。這份工作，上司不會跟你說，這些真不到底，拍電影也要顧市場，做《周報》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。你更發覺這條路不會有錯，因為很多人也是一路走來，並且越來越多人去研究。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互相砥礪，一起傾一起發表，有感性也有理性。我們受人啟發，同時也啟發人，經歷這樣一個學習階段，我覺得是很滿足的，這是一個比讀大學更有趣的園地。

陸：其實我當時只是做做，有甚麼甚麼，當然有時也預先想一想，也有即興的，因為《周報》也講時間性。公司為何准我們可晚一點返工，因為夜間經常要看話劇、聽音樂、看電影，於是我們的上班時間很自由，只要你把你的事情做好。我試過看西班牙舞蹈團，連續看五晚，我會捉住羅冠樵看一晚，然後請他畫一些速寫，這些是不能預先計劃的。比如那星期在第一映室看了甚麼，就寫出來。

我在新亞和羅富國唸書時，都是幫手做一版<英文版>。當有人辭職，他們也不怎麼請新人，就找我編多一版，又一版。當卡叔去意大利，我和吳平捱了兩年，每人要編六版，甚麼也不用想了，就只好做做。事隔多年當有人提起《周報》，我的感覺是很欣慰、很开心也很奇怪，因為感覺已經像前世的事。

有一件事也很開心，就是日本東京有一位學者，增田真結子，她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關於《周報》，說這是香港第一份有很強本土意識的刊物，這個是李念慈告訴我的。我們做的時候完全不知，做了多年後才慢慢知道。其實也不是我們做了甚麼，比如說劉天賜或其他作者，不一定受我們的影響，《周報》只是一個平台，他們在這裡往往磨練過自己。卡叔也說得對，我們也是受別人啟發，或不自覺地啟發了別人。

我在這裡做了十四年，卡叔做了七年，不過我有五年是兼職，但是完全不自覺的。等於你現在寫稿，一路忙著，雖然有稿來，但有三份一要自己寫，並且你要報這一些新聞。剛才卡叔也說，我們都是記者、編輯兼校對，所以到現在，我年紀大了，還是有一個總，就是校對總，我看報紙時，還是拎住支票，每當看見一個錯字，我直情病態地，好開心，嘩有錯字，這是很不應該，但我校對了幾十年，我是不想有一隻錯字。但你問我是否自己就沒有錯字呢，當然不是。因為有時是看五次也看不到，印出來才特別清楚。

《周報》的內容題材怎樣構思？編輯之間會否因為意見不合有爭執，後來又怎樣達成共識？

陸：這個可分幾個情況來說。比如我們分版來編輯，一個總編輯下面有四、五個編輯。編輯除了有我、還有陸離、吳平，何法漢、張凌華（後來去了兒童樂園任主編）和蔡廣，每人負責編兩、三版，比如，吳平之前是王蒙雅編<文藝版>，其實不同編輯有不同特色，總之是各版不同，每一個時期也不同，有些編輯搞得緊，有些搞得鬆，也有一些互通聲氣，前期後期也不同。我自己會一早安排稿件，也限了多字，如果我向你的稿是五百字、六千字、八百字，超過二三百字我會刪減你的字數，然後跟你說原因，也不能像月刊或學術刊物般，改完後可給你看看，這是不可能的。那時大家都是年輕人，沒有甚麼大問題，不會有甚麼落唔到台。吳平也很有系統，印所有稿又留下些空位，給人畫插圖。有人喜歡即興的，總之我們之間是有交流的，看<電影版>或<文藝版>也好，我們有交流，有不同意見和作風，卻很少爭執。

陸：我們早期的總編輯，只是說不淮提左派。後來京劇《楊門女將》上映，那時已可以整版去寫。只是說剛才那位總編輯，雖然嚴格但人很好。我記得有一次吳平刊登了人民公社的評論和插圖，也被抽出來，因為發行公司，友聯有很多部門，他們十分忠貞。我們出《周報》也是計中華民國曆法。後期由也斯、劉天賜他們接手編年幾，他們有沒有用公曆，我也忘記了。我記得我離開周報時，都是用中華民國的。發行公司當時看到這些圖片是很驚的，以為點解要報道人民公社，直頭整份報紙抽起，不准出街。那天是沒有報紙的。後來我們在第二期交待這件事，並將兩期編作一期出版。因為當時 1971、72 年，中共加入聯合國前夕，還有很多人是很有忠貞的。到中共入了聯合國，很多事情便一直變。1976 年文革方才完結，當時點解文革，主要整個竹幕我們不知，是奪權還是文化大革命？看到有很多屍體內地漂下來，我們才知。我記得《明報月刊》有一個座談會是談論究竟奪權還是文化大革命，有人估是毛澤東奪權要打到劉少奇。當時是竹幕，而蘇聯是鐵幕。中共 1949 年立國，一群知識份子走難來香港，然後錢穆先生、唐君毅先生成立新亞書院（新亞書院跟《周報》的關係很密切），《周報》1952 年創刊時唐君毅先生有為它題字，恭賀創刊。

我自己也是讀新亞的。我也像一個目擊者，看它一直在變。我自己的深刻印象，當中共入聯合國之後，很多事情都變了。1976 年毛澤東去世，和你們談起，也勾起一些回憶。中共立國頭三十年，是很亂的，死了很多人，大躍進、大飢荒，不斷鬥爭。《周報》受時代影響當然很厲害。

陸：我這樣想，時代對我們一定有影響，但不是友聯的政策直接影響我們。我們能夠在那段時期，搞了這麼多現代派、現代主義，是因為 1963、64 年前後，友聯行政上比較亂。《周報》又換社長，又換總編輯，有一段時期也沒有社長，司馬長風和胡菊人也離開友聯。

我覺得當時友聯給我們這班新人搞那麼多，是因為 1964、65、66 年，他們已經變身，一派著重文化理想，一派著重業務，比如推廣發行銷路，要自給自足。我在 66 年當了總編輯，中間並沒有人跟我們談政策。65、66 年之間，林悅恆來了當社長，開始有明確的編輯方向，給了編輯很大的自由度。我在 67 年，下半年的時候離開周報，便看到它的資源越來越少，以前一個人編兩至三版，現在是四版，真的很辛苦。

陸：那時候開始，香港有示威，有社會運動，我們跟不上了，我們只能報道，有讀者怨我們為何只報道，而不去做些甚麼？但我們有甚麼可以做？加上我們編的，有些人會喜歡，有人會很不喜歡，所以那個壓力也很大，後來 1972 年我就離開《周報》了。



黃書房

羅：我覺得周報跟得上時代，1967年後《周報》更多關注香港社會、關心公民權益，也有更多文化教育的篇幅，報道學運，講新思潮、哲古華拉，甚至是馬克思的思想，因為年輕人要了解這些。現在你看香港也沒有這些刊物，會為你解釋甚麼是左甚麼是右。

1968年後岑岑飛寫甚麼是新馬克思主義，甚至人民公社。我覺得《周報》了解時潮，不是有心去煽動人，我覺得一份刊物應該如此，立場應該是解釋給人知，我們現在的形勢如何，是給人知識、開導人，而不是煽動。《周報》的內容到後期還是好的，它還是著重報道和啟發，啟發人做一個關心香港社會的公民。

《周報》介紹這麼多新的電影、音樂、文藝，當時從哪裡得到這些資料？

羅：這主要是編輯允許你，上頭開放一個平台，自然就有人會寫，除非說這份刊物一定要談比如是宋明理學，不給你機會說其他事物。而且我們是開放的，最難得是這份雜誌可以由哲學大師唐君毅至中學生也可以為《周報》寫稿。《周報》接受各式各樣的投稿，研究生、大學生、中學生、職業青年也可投稿。

除了開放一個平台，還有甚麼路線這些？

羅：至於路線，我們還是堅持中國的傳統文化，跟西方文化與科學民主自由的結合，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，跟中國文化的復興。後期嘗試變成音樂流行雜誌那種，發現此路不可行。即使到後期，《周報》還是沒有脫離這種路線。香港出現暴動，內地有文化大革命，一方面它批評國內文革，揭發香港社會的不合理性，批評港英的教育制度，探討青少年問題。它也支持中文運動，不以煽動的態度去做。

羅：後來友聯似乎有兩條路線，說我們要自立，不要再倚賴美金。他們有一部份是對的，我們應該商業一點。但商業一點又弊，直情是另一條路線。剛剛卡叔說政治跟文化一起，對我來說文藝就是文藝，不要政治。雖然那時暴動我也有寫一點東西，但那是很直接、很直覺的反應，我不是太喜歡真正政治的東西。

當時司馬長風先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，讀者會仰望一個作者，但那個作者，不見了，而他本來是磐石來的。他的〈生活與思想〉教我們很多東西、人生道理，有時我看著，這些是我寫不出的。他忽然不見了，然後知道一路在換人，但我不理，因為這個不出奇，一間機構，有些鬥爭是很正常的。但你知道有些東西忽然不見了，剩下你在這兒，剩下卡叔、我和吳平。最後剩下我和吳平兩個人……真的是越來越有種孤兒的感覺。

或者我會縮窄了在文藝上，好像鸵鳥一樣。但現在回頭望，原來我不是很積極去投入社會、沒甚麼社會性，仍然是很欣慰滿足。特別是久不久又有人提起，又看見《影評十年》（《60風尚—中國學生周報影評十年》）那兒，陳冠中說……嘩，原來《號外》早期，是很受《周報》影響，他們最初那幾期直情是《周報》的大小……感到很安慰，有一種抽象的滿足，一種悲與喜的滿足，因為回頭望，《周報》其實也很慘——但當時整個香港都很慘，當然香港現在也很慘。

《周報》內哪一版是你最喜歡的？

羅：你這個問題應該問讀者，不是問我。編者當然喜歡自己編的那一版，會關注多一點，好不好也要。我們編者本身很難說的，做總編輯更加每一版也要看，看它的內容不平衡。我覺得看得多你便不覺得「喜不喜歡」，等於一個導演，你拍完一套戲，



徵求
200名熱誠、真正喜愛電影的
中國知識青年
■ 每週出版，每週一、四、六出版
■ 每週出版，每週一、四、六出版
■ 每週出版，每週一、四、六出版
■ 每週出版，每週一、四、六出版
■ 每週出版，每週一、四、六出版
College Club 1967

可能因為剪片，已經看了幾十次，感覺已經很麻木，沒甚麼喜不喜歡的。可能幾十年後重看，便覺得：啊，喜歡這個多一點，這部份多一點心，這個特別辛苦，這個出來效果特別好……你問我，我當然特別關注〈電影版〉，因為是我自己編的，自然特別注意，比如〈快活谷〉，經常看的，覺得它是很生動有趣的，跟現實很接近的。或者〈生活與思想〉我也看的，看它在說甚麼，有些前輩用很簡簡的言語去寫出來。〈文藝版〉，遇到好的文藝小說、新人寫的東西，我也有看，也喜歡。很難說哪一欄或哪一版特別喜歡，除了我自己編的之外。

羅：其實真的差不多，但卡叔你不要謙虛，你的〈大特寫〉專欄其實寫得很好，一期一個明星，有一些詩的感覺，以及這麼短又寫到那個明星出來，無論是資料還是感覺，真的很不錯。

也想問一下，為甚麼那麼多種藝術形式，你們會如此喜歡電影？

羅：六十年代成長、當時十來廿歲的人，喜歡文藝也會喜歡電影。因為當時青年人的文藝風氣相當勁，而電影是一項比較新的媒體，剛好是文字過渡到電影的年代，所以那時我們同時會喜歡文藝，也喜歡電影。那時所謂的文藝青年便是這樣，喜歡文學和藝術。當時年輕人受到很多壓抑，家裡又壓抑，縱使對社會、政權有很多不滿，卻也不像現時的人罵政府，罵當權者，只能用一種婉轉方式去表現，這也就成就了很多文藝和創作。

面對文化大革命，面對香港一個大暴動，文藝青年起初很徬徨，對港英或港左不滿，也不能take side。於是我們在電影裏找一些論題來講，我們反覆討論《春光乍洩》(Blow Up)，因為它是說藝術和現實，一個人如何面對一個新的環境，他的徬徨與虛無，我們看到這一點便不停討論……然後便被人罵了：「大暴動了，你還在說《春光乍洩》！？」你應該有政治立場。」面對這樣的環境，我也難以抉擇，但有很多自省和自我懷疑。67年後，我和一班朋友開始用8厘米機，開始拍些短片，表達內心的徬徨與無助。文藝青年的苦悶，終可在藝術世界找到寄托。

羅：補充一句，卡叔說：「因為喜歡文藝，所以喜歡電影。」這是對的，但我也強調，第一映室有著時間上的影響，因為它提供了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好電影，那段時間是歐洲——其實日本和美國也是——特別多電影文藝創作。一向喜歡文藝的，便自然會被電影吸引，因為電影這個媒介，是可以由攝影機去寫小說。現在也是，拿個手機便可以拍，現在很多人也拿手機去拍短片和微電影，去寫詩也可以的，現在年輕一輩拍的電影，有不少真的拍得很好，好像詩一樣。那時法國新浪潮和英國的新導演（德國便運了十年）他們真的是用電影去創作，不止是拍商業電影。但是商業電影本身，甚至是荷里活電影，拍得好的時候，即使出發點是商業，其實也是藝術品來的，不是說你拍藝術片、創作文藝才是藝術品。如果你出發點是創作文藝，但拍得不好，它也不是藝術品，而只是一個很糟糕的文藝創作。▲



曾任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的社長林悅恒（圖右），將於2月22日至26日，假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至三號展覽廳舉行「師友書法及手稿展」，屆時將展出林悅恒書法近作逾百件，內容包括「四時讀書樂」（元翁森作品）、「朱子書藝」（朱熹書法）、「朱子抄動」（歷年書法）等主題，書體包括甲骨文、篆書、隸書、行書及草書；形式過承巨幅、瓦當對聯、小手手卷及壓鏡小品等。

黃書房